

《東華漢學》第 23 期；1-42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6 年 6 月

【特邀稿】

《西遊記》與元蒙之關係試論：
以「車遲國」與「朱紫國」為中心考察

謝明勳*

摘要

本人嘗針對現存於韓國，建造於高麗王朝時期（中國元代）之「敬天寺」十層佛教石塔之「西遊」故事浮雕進行研究。「車遲國」故事除見於此塔（圖像文本），亦見於《朴通事》（文字文本），此種獨見於高麗王朝，而不見於中國載籍之特殊現象，應當是一項值得人們關注的研究命題。

本文擬從石塔之建造過程進行考察，推測此圖出現之因由，配合世本「車遲國」與「朱紫國」二事之中與元蒙相關之事例，證明「古本」《西遊記》在元代應當已經存在。「車遲國」故事浮雕可能是政治產物，「朱紫國」故事所載異事乃是元蒙婚制與高麗貢女制度的歷史印記，此乃文學（小說）反映社會之明確事例。世德堂《西遊記》刊本乃現今及見之最早者，學者多認為《西遊記》成於明代，然其書應有所本，其中仍有被眾人輕忽之元代遺跡。

關鍵詞：敬天寺、《朴通事》、車遲國、古本《西遊記》、貢女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引言

清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9《如是我聞（三）》，嘗記述一則「扶乩」之事，其文略云：

吳雲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于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己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也。¹

在此一事涉靈異的傳聞中，扶乩降仙者自云：其乃元代全真教長春真人「丘處機」臨凡。根據文本敘述，當時在場之某人曾經對被神靈附體之乩身進行連續提問，其所問者皆是與《西遊記》有關之學術性問題。首先，是關於「作者」究為何人之公案，通過仙、凡對答，提問者所欲釐清的是：當代普遍盛傳丘處機與《西遊記》之關係。在乩身自稱確為其人（丘處機）所作之後，提問者繼而又根據《西遊記》書中若干「單元故事」曾經出現之「職官」名稱，進一步推問：何以「皆同明制」？提問者於此蓋以簡單之「時代先後」方式進行提問，然「雖易實難」之提問卻頓時讓扶乩降仙者為之語塞，神靈不再附體。據此，則丘處機為《西遊記》作者之說顯然有「錯亂時代」之嫌，勢難成立。其後，紀昀遂接續此一對話，做出「《西遊記》為明人依托無疑」之明確結論。

在上引文中，紀昀以多項職官（錦衣衛、司禮監、東城兵馬司、翰林院中書科）之設立年代，做為推斷《西遊記》「成書時間下限」之做法，自是一種「信而有徵」且深具「詮釋有效性」的論斷方式。之後，魯迅更是根據此一結論，直陳《西遊記》一書「決為明人依託，惟尚不

¹ 見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頁189。

知作者為何人」²，將《西遊記》視為是明代之作。面對上述二人之說，人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紀氏所設計之學術問答，但只是證明其所及見之《西遊記》的成書年代³，而「決為明人依託」之說法並無法有效證明，目前傳世之最早《西遊記》刊本「世本」是否有所依承；且在世本面世之前，其所據以重編改寫之「古本」《西遊記》的真正成書年代，亦無法從中得到明確答案。

眾所周知，《西遊記》一書係以唐代玄奘法師「西行取經」故事為藍本，據以鋪衍而成之文學名著，它是屬於「集體累積型」的一部小說。⁴歷來，西遊故事對於人、事之描述，係漸次「由實轉虛」⁵，而後世絕大多數人們心中所認知之三藏法師的人物形象，實則並非是來自《大唐西域記》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深具宗教意義之作的文字描述，而是源於通俗小說《西遊記》的口耳相傳。通過這部文學奇書，三藏法師逐漸脫離近人且具神奇色彩之「真人真事」，慢慢朝向以神魔爭鬥為主之「神異性」的方向發展，而原本對於一代聖僧西行遊歷的高聲讚頌，亦逐漸轉變成為一趟充滿神奇、怪異色彩之「冒險遊歷」旅程，其對於「異域」的書寫已經不再只是原先單純的「宗教紀行」，而是側重於對取經者向道心志是否堅定提出一連串嚴格考驗之文學想像。

事實上，百回本《西遊記》書中之許多人物形象及故事情節，實乃皆「有所本」者，歷代眾多研究成果均是在指陳此一事實。然不容諱言，

² 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收錄於《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頁143。

³ 據個人推估，紀昀所據以論述之作，應當是明代萬曆年間「世德堂」刊本（簡稱「世本」）之後晚出的一種傳本。

⁴ 所謂「集體累積型」小說，意謂「以同一題材為根據，經過『說話』、戲曲等各種形式的創作累積，最後由小說家寫定的小說。」見引自李時人，〈《西遊記》論略〉（收錄於《《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一文，頁3。石昌渝則言《西遊記》一書並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係「聚合式」累積而成之小說名著，詳參見氏著，《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4），頁331-339。

⁵ 詳參見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唐僧「十世修行」說考論〉一文所論。《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7），頁115-130。

其中仍有許多「懸而未決」之問題，尚待後人稽考。面對《西遊記》這部以「異域」想像為背景，「神魔」對抗為主要書寫內容之文學名著，一般人於閱讀是書時，總是會先入為主的認為，其書多為「想像」之作，而文學創作者總是依違在「歷史事實」與「文學虛構」之間，在人們「虛勝於實」之主觀認定生發的同時，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某種認知上的盲點，使得文學創作中的「歷史真實」，得以從容隱身在「文學虛構」的背後，而不易為人們所發覺。倘若閱聽者只是單純從「文學趣味」的觀點切入，則《西遊記》一書眩人耳目之騰挪變化，確實已經足以吸引住眾人關注的目光，然如果是改從文學「以虛寓實」的角度切入，則潛藏於是書之中且不易為人所發覺的歷史事實，在文學作品多所「諱飾」的情況下，是否能夠為世人知曉，亦將因此而變得難以論定。⁶

二、「車遲國」圖文之文學意義與政治想像

(一) 獨見於高麗王朝之「車遲國」資料

百回本《西遊記》第44回至第46回所載之「車遲國」故事，乃是該書中極具代表性的「單元故事」之一，然絕大多數人們對於其事之故事來源與歷代相關之文獻記載，卻是所知甚少。目前坊間所能及見之數部《西遊記》「資料彙編」，其所蒐錄與本事相關之文獻資料，僅述及《朴

⁶ 因不論後人所提出之見解究竟為何，文學作品總是可以「作者已死」及「虛實交錯」的主張背後，讓所有順理成章的說法，都只是處於「有此可能」的狀態。事實上，任何詮釋觀點的提出，無疑都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假設」與「推論」之上，除非是證據明確、鐵證如山，否則任何涉及假想與推測的文學議題，都必須面對接踵而至之「索隱」聲浪與資料「信度」的質疑；而「有此可能」之說法與是否為「索隱之見」的譏諷，都會讓其說不由自主的陷入「疑信相參」的兩難局面。易言之，論者意欲證成其事固然有其困難之處，因其說往往欠缺明確而直接之證據；而疑者意欲否定其事，雖可以不斷提出質疑，然卻又難以排除此一可能。此類問題勢將存在「可能成立」與「假想推測」的謎團之中，信疑之間則需靜待「可能存在」之資料的面世，方有可能明確斷定其事。

通事》一書徵引長達千餘字之「車遲國」鬥法賭勝故事(參見「附錄一」),除此之外,並未及見其他文獻資料言及此事。⁷歷來之《西遊記》研究者對於本事之推論,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亦只能夠停留在不斷強調此一材料在「西遊源流史」上的重要性,以及聚焦於前後文本之間詳略關係的探討⁸,並無法在極其有限的材料下,做出更多超出文本敘述的假想與推論。

晚近數年,本人曾經針對現存韓國,建造於高麗王朝時期(中國元代)之「敬天寺」(含圓覺寺)十層佛教石塔之「西遊」故事浮雕進行研究⁹。在完成初步解圖及相關外圍問題的探討過程中,對於石塔之建造歷史及相關人事,亦同時進行追索,其中仍有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廓清,而「車遲國」故事無疑是其中最為值得人們深入關注的研究命題之一。

敬天寺十層佛教石塔(包含:塔身十層、塔基三層,故又名十三層石塔)係一亞字型建築體,塔高約13.5公尺。其中,塔基第二層部分為西遊故事浮雕,凡有二十幅圖。依照浮雕之形製大小,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大面圖四幅,一是側面圖一十六幅。所謂之大面圖,係指東、

⁷ 於此所言,係指目前所知,學界整理並刊行出版之西遊資料匯編著作,依序為: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蔡鐵鷹,《西遊記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凡三部。

⁸ 《朴通事》所載之「車遲國」故事,主要之為崇作怪者,包括:伯眼大仙(虎精)與鹿皮(不詳);而雙方賭勝之內容,包括:起頭「坐靜」,第二「櫃中猜物」(桃子變桃核),第三「滾油洗澡」,第四「割頭再接」。迄至百回本《西遊記》所載之「車遲國」故事,主要之為崇作怪者,包括:虎力大仙(黃毛虎)、鹿力大仙(白毛角鹿)、羊力大仙(羚羊);而雙方賭勝之內容更是多樣,包括:祈雨(虎力)、雲梯顯聖(虎力與鹿力)、隔板猜枚(宮衣變破衣、桃子變桃核、道士變和尚:鹿力與虎力)、砍頭再接(虎力)、剖腹剌心(鹿力)、滾油洗澡(羊力)。單就文字篇幅而言,已由一千多字擴充至於三回之篇幅,主要精怪亦是由一化三,賭勝鬥法之內容,更是加倍擴大,乍看之下,實完全符合「由簡到繁」之文學發展規律。

⁹ 於此所言,係指本人執行之國科會 101-10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韓國所見元代石塔《西遊記》浮雕研究」(NSC 101-2410-H-194-088-MY2。101/08/01-103/07/31)。

南、西、北四個正面圖像，每一幅圖長約860mm，寬約260mm。其所圖繪之故事內容，分別為：東面之「唐太宗設大會」，北面之「唐太宗送三藏」，西面之「車遲國」，南面之「歸東土」。透過此四面大圖，可以將唐僧西天取經的重要歷程予以清楚勾勒。詳言之，四幅大面圖所採用之故事情節，應當是建造者認為最具代表性之西遊故事。依照「逆時鐘」順序¹⁰審視此四事，大抵與神話之「英雄冒險」¹¹過程相吻合，其所代表之意義分別為：取經緣起、啟程出發、冒險遊歷與英雄回歸。¹²至若所謂之一十六幅側面圖，每一幅圖長約680mm，寬約260mm，係指在亞字形石塔四面大圖之間的小圖，每幅圖像所繪皆是《西遊記》之某一「單元故事」¹³。（參「附錄二」）毫無疑問，石塔西遊故事浮雕基本上是採取「一事一圖」的方式進行雕鏤，對於臨塔觀視圖像者而言，圖

¹⁰ 四大圖之次序，應是自東起始，依照「逆時鐘」方向進行，然此一「非順而逆」之次序，與佛教之傳統觀念顯然相悖，其事究竟是建造當初南北二圖之無心錯置，抑或是建造者有意為之，具有隱微之義，確實有許多想像之空間。（參見註47）

¹¹ 此說可參見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英雄的歷險」一章所論。（頁49-260）

¹² 東面大圖「設大會」，係西行取經之緣起，先此之前，「魏徵夢斬涇河龍」事則是設大會之主要原因，而設大會之目的則是在於超度亡魂。北面大圖「送三藏」，係西行取經之起始，太宗皇帝率朝廷大臣相送，將西遊故事之基調予以重新定位，玄奘由歷史之偷渡出關，改為文學之奉派西行，其事「由史至文」之巨大轉變，無非是「神聖其事」之一項做為，亦為艱困困苦之取經歷程憑添許多文學趣味，擴大其事之影響。西面大圖「車遲國」一事，意在彰顯西行路上多妖魔之事實，係種種魔難、考驗之代表，以本事為表徵是否別具深義，值得深思。南面大圖「歸東土」，則是西行取經之最後終點，唐僧師徒一行將歷經千辛萬苦，在通過種種「刁獷」考驗之後的成果，進奉與太宗皇帝。四面大圖之故事內容，依照「逆時鐘」方向進行解讀，分別為：取經緣起、出發、考驗、完成，其事亦符合神話學者侃伯所提出之英雄冒險遊歷之考驗歷程，呈現「圓形回歸」之文學敘事模式。

¹³ 一十六幅側面圖，分別是：東面之「沙和尚」、「寶象國」、「蜘蛛精」、「紅孩兒」等四圖，南面之「烏雞國」、「比丘國」、「地湧夫人」、「六耳獼猴」等四圖，西面之「獅子怪」、「火燄山」、「人參果」、「四聖試禪心」等四圖，北面之「受心經」、「女人國」、「取真經」、「魏徵夢斬涇河龍」等四圖。詳參見謝明勳，〈韓國敬天寺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圖解〉一文所論。《中語中文學》第56輯（2013.12），頁163-214。

像文本與文字文本之呈現方式，雖然有所不同，然圖像文本無疑具有「見圖知文」之文學功效。有見於西遊故事浮雕各圖所繪與其後刊行之世德堂本《西遊記》所載之故事內容大抵相符，人們通過現存之「文字文本」與石塔浮雕之「圖像文本」的相互印證，在理解「敬天寺」（含圓覺寺）佛教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圖像構圖與故事內容，實際上並無太大問題，足徵此二者之間應當存有一定程度的承繼關係。

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在四幅正面大圖中，即所謂之「取經緣起」、「啟程出發」、「英雄回歸」的安排，均與大唐太宗皇帝密切相關；然令人感到疑惑費解的是，在眾多具有「考驗」性質之單元故事中，「敬天寺」石塔浮雕之建造者，何以挑選「車遲國」故事作為四面大圖之一，亦即建造者何以將其視為是「冒險遊歷」故事之主要代表？而完成於「世本」之前，目前得以傳世之兩筆「車遲國」資料，何以獨見於高麗，此一現象又應做何解？拙著〈韓國所見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重要性試論〉一文嘗對此提出質疑，文云：

「車遲國賭勝」一事在百回本《西遊記》之外，書面資料僅見《朴通事諺解》一書所引之《西遊記》（平話），外此，歷來之相關文獻資料皆未見提及。事實上，韓國境內尚保存一座建於元末之佛教石塔（敬天寺），其中有關「西遊」故事之浮雕，凡二十幅。殊為可惜者，因部分浮雕已經毀損，難窺全貌，然經由現存浮雕的內容以觀，仍可得知其所繪者究為何事，「車遲國賭勝」故事亦為其中之一。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此二者涉及「車遲國」的文獻資料，不論是書面所載或是文物所雕，皆存於韓國，在中國歷代的相關文獻資料中，則未曾有片言隻字述及此事，此一頗堪玩味的現象，似乎隱隱透露出一項非比尋常的訊息，意即此一故事的出現或與高麗王朝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¹⁴

¹⁴ 見《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2013），頁 90-91。

本此概念可知，在敬天寺佛教石塔西遊故事浮雕的「圖像文本」之外，「車遲國」故事之「文字文本」（參「附錄三」）則是見於約略同一時期之《朴通事》一書當中，該書乃是高麗王朝人民學習漢語之主要教科書¹⁵，其以「平話」之文學體式的敘事方式所呈現之車遲國故事，乃是目前所知在明代萬曆20年（1592）金陵世德堂本《西遊記》刊印之前，世上現存唯一的「文字文本」，而敬天寺（含圓覺寺）佛教石塔西遊故事浮雕，則是現存早於世本，且具有相當完整性之「圖像文本」。除上述二者之外，並未於其他中國相關典籍或文獻資料中及見與此相關之紀錄。此一事實更令人們對於世本面世之前《西遊》的傳世狀況感到好奇，而「車遲國」故事何以獨見於高麗，然卻未見中國相關載籍傳錄之現象，是否具有特殊原因，亦因此而憑添出幾許想像空間。

敬天寺十層石塔建造於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距離元代覆亡僅僅只有二十年，距離世本《西遊記》之刊印時間，約有一百四十四年，其西遊源流史上之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然不容諱言，該座石塔向為文學研究者所忽略，尤其是從事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之研究者，多年來均未曾注意到這座建造於元末之佛教石塔，而塔基第二層之二十幅「西遊故事」浮雕，其與百回本《西遊記》之關係更是密切，十分可惜的是，近代之相關研究對於此一重要文獻資料的關注，幾乎是付

¹⁵ 高麗時期（918-1392）設有「通文館」，下設專司漢語教育之「譯學」機構，名曰「漢語都監」。根據《李朝實錄·世宗實錄》卷20（世宗五年，1423）「緣無版本，讀者傳寫習誦，請令鑄字所印出」之記錄可知，《老乞大》與《朴通事》二書，至遲在明永樂21年（1423）前便已經在習讀者之間「傳寫習誦」，此二書反映的是元末明初之漢語口語與社會文化特點。見引自徐忠明，《《老乞大》與《朴通事》：蒙元時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第一章之「老乞大與朴通事」一目（頁5-15）。又，對於此書之成書年代，羅錦堂認為，《老乞大》和《朴通事》二書是在「中國元代（1271-1368）流行於高麗的兩本漢語教科書，而且也是當時最具權威的會話手冊。」見《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頁7。下引同此。丁邦新則認為此二書是「朝鮮李朝初期（1392之後）學習中國話的兩種重要的教科書」（頁1），丁氏並且根據相關文獻資料考訂，推測《朴通事》一書的成書年代「不得早於1346年」，大約成於「1346與1423年之間」（頁2）。羅、丁二人各有所主，可參照。

諸闕如。事實上，根據敬天寺石塔西遊故事浮雕所雕鏤之圖像內容，人們應當可以推估，原本屬於臆測猜想之「古本」《西遊記》，應當是確實存在；其次，則是根據塔記銘文及《朴通事》所載之「車遲國」故事進行推測，車遲國故事之「圖像文本」與「文字文本」的出現，極有可能是元末政治爭鬥下的文學產物。以下，試就上述二點分述之。

（二）車遲國「圖像文本」之文學意義

依照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一般性規律，「文字文本」的出現時間應當是要早於「圖像文本」。由於敬天寺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構圖、雕鏤均極為精美細緻¹⁶，而且具有相當數量，據此當可合理推論，當初興建敬天寺石塔時，施作之工匠或有據以參考之「圖像文本」，設若此一假設得以成立，則元代應當有一與「世本《西遊記》」密切相關之「古本《西遊記》」存在。¹⁷大陸學者石昌渝嘗根據目前所知之「文字文本」資料進行推測，推估在世德堂本《西遊記》面世之前，應當有一「古本」《西遊記》存在¹⁸，其說當可據此而得到證實；然世本《西遊記》所載

¹⁶ 朝鮮·蔡壽，《懶齋先生文集》（1568）卷四〈雜著〉「遊松都錄」一文，嘗云：「戊子，出承濟門，行二十餘里，至敬天寺。經火，但存一室，庭中有石塔，光瑩如玉，高十三層，雕刻十二會相，窮極精巧，殆非人力所造。寺乃元奇皇后願剎，而塔亦中國人所作，渡海來建于此。當國步艱危之日，惑於內寵，勞民力，以事無用如此，元祚之不長宜矣。僧出所藏寶珠、長幡以示之，珠徑數寸，光艷照人，幡亦織金為之，皆當時奇后所施者也。又出脫脫丞相畫像，半已脫落，不可辨識。」（此據蔡鴻淵 1938 年石刻本，4B-5A）「窮極精巧，殆非人力所造」一語，業已點出敬天寺石塔浮雕之細緻精美，故言。

¹⁷ 謝明勳，〈韓國敬天寺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圖解〉一文曾經指出：「目前存世之元代平話：《全相平話五種》，約刊印於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較諸敬天寺石塔浮雕之建造時間（1348）略早。經由《全相平話五種》可以推知，『文圖並存』之形式在元代話本小說之中當已出現，此類插圖不僅具備吸引讀者目光之商業販售功用，且與文字文本一樣具有敘事功能。」（頁 205）由是可知，元代刊印之平話小說，不論是「上圖下文」或是「一事一（數）圖」，皆應有之，「文圖並存」就當代刊印之小說而言，應屬常態。據此故言。

¹⁸ 石昌渝，〈《朴通事諺解》與《西遊記》形成史問題〉，《山西大學學報》

之「車遲國」故事是否已經見載於古本《西遊記》中，因尚無足夠之相關資料作為佐證，對於此一難以完全確定的問題，目前亦只能存疑待考。¹⁹

眾所周知，《朴通事》一書係高麗王朝時期所編之「漢語教科書」，其書係以「口語對話」方式講述「車遲國」故事，就漢語教科書的學習立場觀之，設若其事真有所本，為符合「漢語學習」目的，其所載錄之文字內容必然經過一定程度之改編，當非原本之「小說敘事」樣態。至若其事是否為一則原本獨立之「單元故事」，在「故事新編」的概念下，依照西遊故事的敘事架構宣講其事，之後再由西遊故事加以吸納，成為其書之一部分，依照《西遊記》之成書過程以觀，此一假設當不無可能。易言之，其所書之故事內容是否為「古本《西遊記》」所有，抑或是在「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架構下，「有意識」的借用其所特有之敘事模式，言述一則「別有寓意」的單元故事，確實存有足資討論與想像的高度空間。

（三）車遲國「文字文本」之政治想像

敬天寺十層石塔之興建緣起，在塔身第一層所刻鏤之塔記銘文即已清楚表述，試先徵引如下：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3 期（2007.5）一文曾經指出：「《朴通事諺解》不是高麗時代（大約在元末）的文本，它經過了朝鮮時代（大約相當於明代和清代）人的修訂。……儘管它的祖本產生在元代，但我們卻不可以把它定為元代文獻，並根據它做出《西遊記》至遲在元末就已經成熟，就已經相當接近百回本的結論。」（頁 57）石氏對於《朴通事》版本、成書過程之說解，或許正確，然據以否定元末已有成熟之「西遊」故事之說，則顯然不甚為確，敬天寺石塔西遊故事浮雕的出現，相信可以直接證明，在世本《西遊記》面世之 144 年前，應當已有一部與之相近之「古本」《西遊記》的存在。

¹⁹ 石昌渝，〈《朴通事諺解》與《西遊記》形成史問題〉一文曾經指出：「車遲國鬥法的文字，是原本《朴通事》就有的，還是明代中期以後修改過的？沒有看到原本之前，實難做出定論。」（同前註，頁 55）石昌渝的「合理」懷疑，在敬天寺、圓覺寺西遊故事浮雕（圖像文本）出現之後，應當可以得到較為明確之答案。至若車遲國故事在元代應已出現，然其是否為古本《西遊記》中已有之「單元故事」，甚至是《朴通事》是否經過修改，因無「文字文本」傳世，目前亦只能存疑待考。

大華嚴敬天，祝延皇帝陛下萬萬歲，皇后皇□□（勳案：鄭恩雨認為損毀之二字當為「太子」，其義可通，竊以為或為「子千」二字，「千」字連下讀，語意當更完備。姑存疑。）秋文虎，協心奉□，□（勳案：當為「風」字。）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現獲福壽，當生□□覺岸。至正八年戊子三月□日，大施主重大匡晉寧府院君姜融，大施主院使高麗鳳，大化主省空，施主法山人六怡，□□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²⁰

根據上引文字可知，該座石塔建於「至正八年戊子三月」（1348年3月），捐款建塔者主要有二：一是「大施主重大匡晉寧府院君姜融」，姜融之女具有高麗貢女身分，乃是繼伯顏之後不久出任丞相之脫脫的一名姬妾²¹；一是「大施主院使高麗鳳」，其人乃是元順帝（1320-1370）時，以貢宦身分進獻至元蒙帝國之高麗宦官「高龍普」²²。由高龍普與姜融二人出資興建之「敬天寺十層石塔」，根據銘文記載當可得知，建塔之目的旨在為高麗王室及元蒙皇室進行祈福，希望舉國皆能因是而得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法日益廣佈。²³

²⁰ 此段「造塔銘文記」，係根據鄭恩雨，〈敬天寺址 10 層石塔三世佛會考〉，《美術史研究》第 19 號（2005.12）一文所錄之「白文」，加以標點、訂補而成者。頁 34。

²¹ 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一書有云：「元丞相脫脫龍姬姜氏，高麗晉寧府院君姜融女。」（頁 140）其所言者，典出朝鮮·鄭麟趾撰，《高麗史》（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史部 162 冊，1996）卷 124〈姜融傳〉，文云：「融本姓名康莊，其祖晉州官奴。融忠宣時拜內府令。妹為巫，食松岳祠。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戴勳功臣號，累陞贊成事，封晉寧府院君，忠定元年卒。子千裕，婢妾出也，恭愍以其妹為元丞相脫脫龍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頁 231）。

²² 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一書有云：「奇氏專權時期，在元朝政壇上先後出現兩個權勢顯赫的高麗籍宦官。前期為資政院使高龍普（即高麗鳳、高龍卜，蒙古名禿滿迭兒、禿滿滿夕兒），後期則為朴不花（蒙古名朴帖木兒不花）。」（頁 126）據此故言。

²³ 當然，除了此一明顯且可以昭告世人之政治及宗教意圖之外，其中當不無

由於「高龍普」與奇皇后的關係極為密切，加上「姜融」與繼伯顏之後出任丞相一職之脫脫間具有特殊關係，遂讓人不由自主的對此進行聯想，西遊故事浮雕之中是否可能暗藏玄機？誠如上述所言，表面看來，建造佛塔之目的乃是為國家、君主進行祈福，然據銘文所載與之相關的數人（高龍普／奇皇后、姜融／脫脫、元順帝、高麗國王），他們存在著國族、宗族、姻親、政治等略顯複雜之錯縱關係，而且每一條線索所涉及之人物，均與大元帝國之丞相伯顏存有芥蒂，此一層足讓眾多當事者耿耿於懷的不良情緒，遂讓敬天寺石塔之建造及「車遲國」一圖之驀然出現，充滿了政治與文學結合之無限想像。²⁴

一是先就高龍普與奇皇后之關係進行說明。

奇皇后係總部散郎奇子敖之女（詳註28），乃是出身高麗之貢女。權衡《庚申外史》嘗載云：

（元統元年，1333年）徵政院使宦官高麗人禿滿滿夕兒者，首薦高麗女子祈氏于帝。祈氏性慧黠，有寵于帝。秋九月，太后謂大臣曰：「正宮未有人，何不選立之？」眾對曰：「今太師丞相有女，端嚴正大，宜為天下母。」于是立太師女伯牙吾氏為后。后權臣家女，習于驕貴，又輕帝年幼，見帝寵祈氏，心不平之，日

有高龍普衣錦還歸故鄉，以及姜融炫耀熾人權勢與納寵朝廷之強烈意圖，而由此二人出資建造，且將其名具刻於石塔之上的作為，無疑是在向世人宣告，二人之間非比尋常的密切關係，憑藉著背後元蒙帝國的強大威勢，其人當可在高麗王朝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²⁴ 金昌協（1651-1708），《農巖集》卷23「游松京記」云：「《勝覽》謂寺即元丞相脫脫願剎，而晉寧君姜融，募元工造此塔。蔡壽《松都錄》謂為奇皇后願剎，塔亦中國人所作，渡海來建。二說牴牾，不知孰是。」（據金甯漢1928年《三刊本》）於此所謂之「《勝覽》」，係指李荇等受命撰之《新增東國輿地勝覽》（1530），該書卷十三「豐德郡·佛宇·敬天寺」條下嘗云：「在扶蘇山寺有石塔十三層，刻十二會相，人物聳動，形容森爽，其制作精巧，天下無雙。諺傳：元脫脫丞相以為願剎，晉寧君姜融募元朝工匠造此塔，至今有脫脫、姜融畫像。」（據奎章閣藏木板本，3B）蔡壽《松都錄》，係指蔡壽「遊松都錄」一文（詳註16）。由是可知，有關敬天寺之建造由來，自來便是眾說紛紜，然此二說所主皆與出資建塔者密切相關。

夜捶楚，祈氏幾不勝。一夕，又跪祈氏于前，窮問其罪，加烙其體。翌日，司天奏：「昨夕火星犯后妃。」帝雖不言，心甚異之。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至是始壞祖宗家法，識者知天下之將亂也。²⁵

事實上，於此所言之「宦官高麗人禿滿滿夕兒」者，指的就是高麗貢宦「高龍普」，因「祈」、「奇」同音，「高麗女子祈氏」指的就是「奇皇后」。根據上引文可知，奇皇后之所以能夠在元代後廷爭鬥中嶄露頭角，最初依靠的就是高麗宦官高龍普的適時引介。在高麗與蒙古長期不公平的進貢關係中，貢女與貢宦同為政治犧牲品，他們同樣出身高麗，因具有相同之國族、文化背景，遂讓流落他邦異國之同病相憐者，對於彼此之淒涼身世與悲楚際遇，產生高度之共鳴效應，此一不可言宣的關係，足以讓雙方因此而相互依委的更加深切。²⁶

毫無疑問，奇皇后係因高龍普之故而得以近侍帝王，在奇皇后逐漸掌握朝政權柄²⁷，高龍普亦因此故而得以於順帝一朝獲得朝廷倚重，備極榮寵。《高麗史節要》卷25載錄高龍普於奇氏受封為元蒙帝國之第二皇后後²⁸，次年旋即出使高麗，並且在之後的數年間，多次獲得高麗忠惠王之敕封，其文云：

²⁵ 見《西使記（及其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之《庚申外史》，頁2。

²⁶ 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一書有云：「在元代，徵選高麗宦官入元也是一種固定的國家制度，是元、高麗兩國關係史上的又一種特殊政治關係。就其本質而言，宦官供奉制度同貢女制度沒有甚麼兩樣，都是元帝國與高麗王國之間不平等權利義務關係的體現。憑藉著元帝國封建皇權的庇護與支持，高麗宦官在元帝國以及高麗王國中都具有很大的勢力，在兩國政治舞台上與高麗貢女集團互為依存，並駕齊驅。」（頁92），據此故言。

²⁷ 奇皇后係元順帝的諸后之一，昭宗之生母，在順帝專心致志於「求長生」活動而不務政事的情況下，其於當時確實頗具權勢。

²⁸ 《高麗史節要》卷25云：「（忠惠王後元年）元封奇氏為第二皇后，本國幸州人，摠部散郎子敖之女，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兄也。」見李宗瑞編，《高麗史節要》（據京城帝國大學藏奎章閣本復印，收入《朝鮮史料叢刊》〔京城，朝鮮總督府，1938〕，頁19B。《庚申外史》云：「唐其勢既死，命撒迪為御史大夫，翁吉刺氏為皇后，乃世

（忠惠王辛巳後二年，1341年）春二月，元遣使來頒改元詔，以宦者高龍普為完山君。……（忠惠王甲申後五年）五月，賜宦者高龍普功臣號。……（忠惠王丁亥後三年，六月）元放院使高龍普于金剛山。龍普在帝側用事，天下疾之。御史臺奏曰：「龍普，高麗煤場人，席寵怙勢，作威作福，親王丞相，望風趨拜，招納貨賄，金帛山積，權傾天下，恐漢之曹節侯，覽唐之仇士良、楊復恭，復起於今日，請誅之，以快天下之心。」帝宥而放之。……（十月）元召還高龍普。²⁹

《高麗史》卷36亦曾載錄一事云：

（忠惠王後二年）甲午，以宦者高龍普為三重大匡完山君。……

（忠惠王後三年）己未，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³⁰等，來迎奇皇后母李氏。王迎龍普等于郊。……戊辰，王宴高龍普于延慶宮。³¹

根據上述二書所載可知，在元朝至正年間，高龍普曾經多次奉命出使高麗，其事之主要關鍵當是在於其人出身高麗，並且與奇皇后有著密切關係。³²憑藉著元蒙帝國的威望³³，高龍普確實於高麗王朝獲得相當程度的

祖后察必之曾孫也，性莊厚，寡言笑，號正宮皇后。復立祈氏為次宮皇后，居興盛宮。二宮並為后，自此始。」（頁3）其時應為至正元年（1340），據此故言。

²⁹ 見李宗瑞編，《高麗史節要》（同前註），頁20A、34B、45B-46A、47B。勳案：忠惠王辛巳後二年，係至正元年（1341）。忠惠王甲申後五年，係至正四年（1344）。忠惠王丁亥後三年，係至正七年（1347）。

³⁰ 勳案：此當謂另名高麗宦官「朴不花」。朴氏之事略，詳參見《元史·宦者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204本傳（頁4551-4554），文云：「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其意甚膠固」云云，由是可知，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因與「奇皇后」同里，因緣柄用，遂與權奸同惡相濟，後迄於誅戮，固有以也。

³¹ 見朝鮮·鄭麟趾撰，《高麗史》，史部159冊，頁726。案：忠惠王後二年，係至正元年（1341）。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一書嘗論及此事（頁114-119）。

³² 在公事之外，高龍普與奇皇后遠在高麗之家人亦有密切來往，彼此應為熟識，具有一定程度之私誼。

尊崇，地位極其顯赫，此皆與其背後勢力的真正來源：元蒙帝國及奇皇后息息相關。³⁴

二是就元順帝、奇皇后與伯顏之關係進行說明。

出身高麗之奇皇后，乃是元順帝冊封之第三任正宮（第一）皇后，然時間卻遲至至正25年（1365），距離其被冊封為第二（次宮）皇后之至元六年（1340），已經長達25年之漫長歲月。（詳註28、37、40、61）

當初，元順帝意欲將奇氏納為元蒙帝國之第二皇后，其事之發展過程誠頗具爭議，其中最為主要之原因，應當是奇氏出身高麗之背景，與蒙古先祖所傳下之祖訓相悖逆，故而招致李泌等眾多大臣的公開反對。

《元史》卷41〈順帝紀〉嘗載錄監察御史李泌之奏章云：

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亦位皇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³⁵

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此一事件發生之時間為至正八年（1348）歲末，朝廷面對當年國內不斷出現之天災人禍，先是有監察御史張楨彈劾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奏章之中甚至提及多年之前（1335）丞相伯顏誅殺嘉王、郟王一十二口之舊事³⁶，當其時也，丞相伯顏雖然已經垮臺多年

³³ 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一書云：「征東行省的府邸設在高麗開京，以歷代高麗國王為左丞相，由元朝派遣省官掌握行省的實權，並成為干預高麗內政的有力工具。與此同時，高麗國原有的一套治理國政的政府機構與征東行省並不重合。征東行省在高麗存在七十餘年，隨著元朝的衰退，高麗國興起收復國權運動，高麗恭愍王五年（1356），高麗將征東行省的核心機構理問所推翻，征東行省才不復存在。」（頁10）據此故言。

³⁴ 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云：「高麗宦者回高麗國大多是以官方身分出現，除承擔降香、貢女、頒發詔令、寫經建寺等任務外，有的還擔負著元朝的特殊政治使命，可以廢立國王、壟斷朝政。他們所到之處，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無所不為，嚴重干擾了高麗的內政，給高麗社會造成了騷亂。有元一代，對於高麗宦官的紀載在高麗史籍中不絕於書。」（頁99-100），故言。

³⁵ 見新校本《元史》，頁883。又，《庚申外史》亦有類似之言：「初，世祖皇帝家法，賤高麗女子，不以入宮。」，頁2。

³⁶ 《元史》卷41〈順帝本紀四〉云：「是歲（至正八年），……監察御史張

(1340)，然此一讓元順帝頗為難堪之陳年往事，無疑是已經明顯侵犯到至高無上之皇權。事發之時，元順帝在權臣伯顏的要脅下，亦只能採取愛莫能助的方式處理至親者即將遭受之殺戮，其事雖然已是事過境遷，然存在於元順帝與丞相伯顏之間的一道深裂鴻溝，相信未必會因此而輕易消失。與張楨同一時期之李泌，則是援引元世祖忽必烈「不與高麗共事」之誓言，刻意提醒元順帝（惠宗）不與高麗女子共事宗廟之祖宗家訓，以此做為勸誡之用。毫無疑問，李泌進呈之奏章所標舉之祖宗家訓，其所持之理由自是堂而皇之，於理有據，相信亦必會對元蒙帝國之嗣位者產生莫大壓力；而李泌將國境之內紛現的天災人禍，歸咎於施政不當，此乃典型「天人感應」之災異論述的特定模式，李泌甚至直指其事之所以發生，係因「陰盛陽漸」之故，當與奇氏立后事緊密相關，在此一深具因果關係的認知前提下，其所提出之具體建議，則是要求朝廷將奇氏降歸為立后之前「妃」的狀態，認為人事若能獲得安定，則四境之天災人禍應當可以順利獲得平息。

不容諱言，過往至今反對奇氏立后一事之大臣誠頗為眾多，其中最為引人側目者，應當是已遭罷黜多年之前任丞相「伯顏」，其在政治上之實質影響力，自是遠勝於監察御史張楨與李泌等人，縱使伯顏已經垮臺多年，然主張此說者仍舊是伺機而動，囂囂甚盛。檢《元史》卷114〈后妃列傳〉載云：

楨核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又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郟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子、兄尚仕于朝，宜急誅竄。……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闖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頁883）。又，《庚申外史》載錄二事云：「至元元年四月，右丞相伯顏奏曰：『御史大夫唐其勢，與其弟答刺海，為文宗義子者，謀為不軌，將不利社稷。』有詔捕之。唐其勢攀檻不肯出，答刺海匿皇后袍下，右丞相復奏曰：『豈有兄弟謀不軌，而姊妹可匿之乎。』並執皇后，以付有司。后呼：『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欲害我，我如何救得你。』亦絞于東門外。……至元三年，以伯顏為太師，答刺罕左丞相封秦王。伯顏本郟王家奴也，謂郟王為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郟王謀為不軌，殺郟王，並殺王子數人。」（頁2-3）據此故言。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家微，用后貴，三世皆追封王爵。初，徽政院使禿滿迭兒進為宮女，主供茗飲，以事順帝。后性穎黠，日見寵幸。後答納失里皇后方驕妬，數箠辱之。答納失里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顏爭不可。伯顏罷相，沙刺班遂請立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改徽政院為資正院。³⁷

由是可以清楚得知，丞相伯顏之去職與奇氏最後得以冊立為第二皇后，此二事應當是息息相關，詳言之，伯顏在立后事件中抱持著強烈反對之態度，此點自是不言而喻。就奇氏之個人立場而言，在她朝向權力高峰攀登的過程中，因其出身背景關係，故反對者眾，丞相伯顏無疑是其中最具指標性意義的政治障礙。當其時也，奇皇后雖然已經深得元順帝寵幸，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可以順利的登上皇后之位，在她由原本身分卑下之高麗貢女，一步步朝向權位高點前進的同時，她必須要排除掉擋在眼前之所有政治異己的重重阻攔，而丞相伯顏無疑是當下這場宮廷政治鬥爭中的最大目標。

伯顏自至順元年（1330）二月擔任左丞相，元統元年（1333）擔任右丞相，迄至至元六年（1340）二月罷相，黜為河南左丞相，有長達十年的時間掌握朝政大權³⁸，當其時也，「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³⁹。元順帝雖然位居九五之尊，然連最為親近之答納失里皇后即將遭受丞相伯顏迫害（1335），亦都無力阻止其事發生（詳注36）；其意欲新立皇后，亦是因遭受丞相伯顏反對而放棄作罷，必須等到伯顏廢相之後始能

³⁷ 見新校本《元史》，頁 2880。

³⁸ 詳參見《元史》卷 112 至 113〈宰相年表〉，頁 2831-2832；2841-2845。

³⁹ 《元史》卷 138〈伯顏傳〉云：「伯顏弘毅深沉，明達果斷。……至順元年，文宗以伯顏功大，不有異數不足以報稱，……四年六月，順帝至自南服，入踐大位，嘉伯顏翊戴之功，拜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三年）七月，伯顏鳩殺皇后伯牙吾氏，為匿唐其勢、塔刺海于后宮。……伯顏自誅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帝患之。……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燄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俛首有慚色。」（頁 3335-3339）據此故言。

遂行其事；而在伯顏垮臺之後大約八年，其原本之舊有勢力依然居於高位，與之相親者仍舊握有相當權勢，這在政治勢力的版圖上，絕對是一股不容輕忽的強大力量。至若元順帝何以對此未曾採取積極做為，它或許是一種政治上的包容，然何嘗不是主事者心中存有投鼠忌器的疑慮。元順帝在面對伯顏丞相主政十年下盤根錯節之人際網絡，縱令是僅只罷黜伯顏一人而未株連其眾，然其黨羽亦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夠順利處理者。

專就上述數點而言，足可見所謂之「伯顏」勢力之既廣且深，而中土境內未見類似「車遲國」故事之相關文獻載錄，然卻獨見於當時征東行省（高麗王朝）之漢語教科書《朴通事》與「敬天寺」佛教石塔浮雕，或許不是一件「偶然」之事，其事之內在深層意義，仍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言之隱，其箇中因由當有值得人們深思之處。

奇皇后在至元六年（1340）登上第二皇后之大位，亦因生下皇嗣愛猷識理達臘，從此之後便母以子貴，此舉亦使得她在元蒙宮廷上的地位因是大幅提升。在蒙古向來重視女性的氛圍中，她因此取得相當尊崇之地位⁴⁰，而其在高麗之家族亦因此而變得不可一世，甚至成為威脅高麗王權的一股力量，讓高麗王朝之君臣一直有芒刺在背的感覺⁴¹。而讓她由原本之「高麗貢女」蛻變成為「蒙古皇后」的關鍵性人物：高龍普，正是出資建造敬天寺的主要人物之一。此數條線索都將石塔之興建與中國元蒙政權緊密相連，甚或是由高龍普而指向其背後之真正權力來源：奇皇后。

三是就脫脫與伯顏之關係進行說明。

除高龍普之外，敬天寺石塔之另一主要出資建塔者為高麗人「姜融」，其女乃是丞相脫脫之寵姬，此二人因是具有姻親關係，此點誠是

⁴⁰ 回顧奇氏之立后過程，誠可說是一波三折。公元 1335 年，答那失里皇后崩逝。1337 年，元順帝（惠宗）擬欲冊立奇氏為新后，孰不知此議一出，旋即招致丞相伯顏之極力反對，最後改立伯顏忽都為皇后。其後，奇氏順利生下皇嗣，母以子貴，益發得到帝王寵幸。迄至 1340 年，終於得立為第二皇后。公元 1365 年，伯顏忽都皇后崩逝，遂正式冊立奇氏為后。

⁴¹ 《庚申外史》載云：「祈后宗族在高麗者，多蒙官爵封號，出則恃勢驕橫，強奪人田地、子女，高麗王屢戒之，不從，王不勝怒，盡殺祈氏一家。」（頁 26）據此故言。

毋庸置疑。（詳注21）至若伯顏與脫脫之間的微妙關係，亦是一項十分值得關注的焦點。《庚申外史》載云：

伯顏與太皇太后，謀立燕帖古思而廢帝，其姪脫脫頗聞其謀，竊以告其師胡直方，直方教之，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預為之防。……（至元五年冬）十二月，伯顏請帝飛放，帝疾不往，伯顏固請，燕帖古思太子同往，遂獵于柳林。脫脫竊告帝曰：「伯父久有異志，茲行率諸衛軍馬以行，往必不利於社稷，帝幸不與之俱往，其奈太子在柳林何？」其夕，即召高保哥、月怯察兒，與之謀討伯顏。⁴²

伯顏與脫脫係具有密切血緣關係之伯姪身份，然因伯顏擬欲發動政變，而脫脫預先得知其情，遂向元順帝進行舉報示警，使其得以順利逃過此一政治巨變，最後終於導致伯顏垮臺。雙方由原本之血緣至親演變到最後之反目成仇，其中之主要關鍵當然是緣於脫脫對於現實政治利益的實際考量，恐因株連而惹禍上身，故而採取與其伯父丞相伯顏截然不同的政治做為。

根據《庚申外史》一書所載，脫脫一家與元順帝、奇皇后與皇子之間的關係實是至為密切。試引錄二文如下：

⁴² 見《庚申外史》，頁 4-5。《元史》卷 138〈伯顏傳〉云：「（至元）六年二月，伯顏自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告帝托疾不往。伯顏固請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欲有所為，遂與世傑班、阿魯合議，白于帝。戊戌，脫脫悉拘門鑰，受密旨領軍，阿魯、世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四鼓，命只兒瓦歹奉詔往柳林，出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顏遣人來城下問故。脫脫倨城門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衙。伯顏奏乞陞辭，不許，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問曰：『爾曾見子殺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見臣殺君。』伯顏俛首有慚色。三月辛未，詔徙南恩州陽春縣安置，病死于龍興路驛舍。」（頁 3339）同卷〈脫脫傳〉亦載錄其事，事同文異（頁 3343），可參看，本傳載云：「是時，其伯父伯顏為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入，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頁 3341-3342）故言。

至元五年冬，皇太子生，名愛育失黎達臘（勳案：《元史》作「愛猷識理達臘」），實興盛宮祁氏之子也。乳脫脫家，呼脫脫為孀公。其後，脫脫因奏令正宮皇后子之。⁴³

由是可知，奇皇后所生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係因脫脫之故而得以掛名在正宮皇后名下，其在孩提襁褓時期，亦是在脫脫家中寄養長大，故稱脫脫為「孀父」，二家之關係自是不言可喻。承前述所言，在丞相伯顏垮臺之後不久，脫脫接任丞相之職，歷經去職危機，最後依憑著與其與奇皇后母子之間的微妙關係，而得以重返大都政壇，《庚申外史》載云：

至正九年，脫脫復入為相。初，脫脫侍親，居甘州，太子愛育失黎達臘與脫脫子加刺張同戲殿外，愛育失黎達臘使加刺負己作老鴉聲，旋繞殿墀三匝。已而，復使加刺作老鴉，而已負之，亦三匝。加刺跪曰：「加刺，奴婢也；太子，使長也。奴婢不敢使使長負。」太子怒，撻之，啼哭之聲聞于帝，帝問之曰：「誰哭耶？」左右曰：「脫脫子加刺張也。」問：「何為而哭之如是？」左右具以對。上喜曰：「賢哉！此子也。」祁后因起曰：「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⁴⁴

脫脫曾因故罷相，居於鄉野，而其子則是仍舊居於大都，並與皇子一同出入嬉遊。脫脫之所以能夠擺脫下野命運，得以重返政壇，都與其子不可思議之做為及奇皇后之適時趁機進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巧合的是，其事發生之時間正好是在至正九年（1349），乃是敬天寺佛塔建成之後的隔一年。由是當可以合理推測，敬天寺佛塔由與奇皇后及脫脫丞相關係密切之兩人（高龍普與姜融）共同出資興建，絕非偶然，或與其背後的勢力來源存有一定之關係。

四是就高麗國王與伯顏之關係進行說明。

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角度，則是丞相伯顏與高麗王室之間極其微妙的政治氛圍。《高麗史》卷36嘗載錄一事云：

⁴³ 見《庚申外史》，頁5。

⁴⁴ 見《庚申外史》，頁12。

（忠惠王二年二月）甲子，元遣留守寶守前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王郊迎伯祥，傳聖旨云：「已於正月三日，命上王復位。」王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王遂如元。初，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悅，視猶己子，因忠肅辭位，奏帝錫王命時，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王不禮，及忠肅復位，燕帖木兒已死，伯顏待王益薄。王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飲酒為謔，因愛一回骨婦人，或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奏帝云：「王禎素無行，恐累宿衛，宜送乃父所，使教義方。」制：「可。」忠肅王後五年，帝遣王還國。八年三月癸未，忠肅王薨。忠肅常呼王曰「撥皮」，待之少恩，然遺命襲位。由是行省左右司轉達中書省，王亦遣前評理李揆等求襲位，而伯顏為太師，寢不奏，且言：「王燾本非好人，且有疾，宜死矣。撥皮雖嫡長，亦不必復為王，唯嵩可王。」揆等百計請之，不得。⁴⁵

高麗王朝之忠惠王由立而廢，忠肅王由廢而立，國王之廢立竟然全憑宗主國丞相之一己好惡而定，即使已經是貴為一國之君的高麗國王，其內心之情緒起伏，必定是難以言喻，其間之諸多辛酸苦楚，後人當可以從史傳微妙的筆觸記載當中不經意窺見。根據上引文可知，高麗國王（忠惠王）在面對元蒙帝國之丞相伯顏時，竟然被當面痛斥為「撥皮」，令人感到難堪的是，此一不雅之名竟如附骨之蛆一般，甚至是在多年之後再次居於王位，它仍舊是如影相隨，而當事者在嚴峻的政治現實下，亦只能毫無選擇的採取隱忍態度，其內心之中深深壓抑的痛楚，實是常人難以想像。

根據上述所言四點可知，不論是元順帝、奇皇后、丞相脫脫或是高麗國之忠惠王，都曾經與伯顏丞相有過一段利害衝突關係，當他們在面對專橫跋扈之伯顏時，或曾經懦弱（如元順帝），或曾經遭受欺凌（如奇皇后），或曾經背叛其人（如脫脫），或曾經遭受羞辱（如忠惠王），

⁴⁵ 見朝鮮·鄭麟趾撰，《高麗史》，頁 732。

其間之相同處即都有著一段不甚愉快的經驗存在，而此數者之間唯一的共同焦點，則是都同時指向「伯顏」一人。

一如前述所言，在敬天寺之20幅「西遊」故事浮雕之中，西面大圖何以選定「車遲國」故事做為冒險遊歷之代表？且其事並未及見有中國任何相關文獻載錄，僅有高麗王朝時期之漢語教科書《朴通事》（含後來之《朴通事諺解》）及見相關之「文字文本」記錄，而《朴通事》所載車遲國故事中之「便使黑心」之負面人物，其名恰巧又是「伯眼大仙」。這自然是一個十分有趣且極為弔詭的現象，「何以若此」應當是一個亟待深思的文學研究命題。

根據敬天寺之塔記銘文所載，出資建塔者中最為主要的兩個人物，一是高麗人姜融，一是高麗貢宦高龍普；前者所代表的背後勢力，為繼伯顏之後出任丞相之脫脫，而後者所代表之勢力，則是指向出身高麗之奇皇后。除此之外，銘文所標明之建塔目的，係為高麗王朝與元蒙帝國兩國人民祈福，然不論是以高麗為藩屬之元蒙帝國的主宰者元順帝，或是石塔建塔之所在地（開城）的高麗國王忠惠王，他們都曾經與丞相伯顏發生過嚴重嫌隙；塔記銘文表面上之官方正式宣揚，似乎隱藏著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共同想法。詳言之，塔記銘文上的幾個主要關係人，都曾經與伯顏發生過齟齬，彼此不甚相合，此一刻骨銘心的歷史真實，此數人又是如何宣洩其內心之中的不平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一特殊時空背景下所興建之敬天寺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西面大圖，與《朴通事》所載之「車遲國」故事中之「伯眼大仙」，似乎可以承擔起重謗之譏的重責大任⁴⁶，它或許是一個新創的故事，也可能是一個被更易過人名的舊有傳聞，卻在此一時期成為前述數人皆可接受的負面人物，倘若眾人意欲覓得一個可以宣洩情緒的潰口，而又不損及個人及邦國之利益，選

⁴⁶ 《朴通事》所載之「車遲國」故事中，竟然出現一名「見國王敬佛法，便使黑心，要滅佛教，但見和尚，便拿著曳車解鋸，起蓋三清大殿，如此定害三寶」之負面人物，無巧不巧的是，該名人物竟然名曰「伯眼」，其事是否具有含沙射影之成份，甚至是假由文學作品藉以達到批判敵對人物之根本目的，在諸多時代氛圍齊備的情況下，不免讓人對此產生諸多聯想。

擇一個適當地點與採取雖隱實顯的合適方式迸發而出，誠是一點也不足為奇。

眾所周知，高麗王朝其時已被元朝設為征東行省，係屬藩屬附庸之地，雙方具有極為不公的朝貢關係。高麗王朝以佛教為其國教，高龍普以特使身分前往該地，在遠離中央政治中樞，銜命前往邊陲之一隅，並於當地興建一座具有元代喇嘛與高麗色彩之佛教石塔，做為元蒙帝國與高麗王朝兩個政權之間，關係永固的一項具體表徵。然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該座新建石塔並非是建造在中國本土境內，而是在奇皇后的出身之地高麗首都開城，而出資興建此塔者，一是奇皇后之心腹高麗貢宦高龍普，一是與接續伯顏出任丞相之脫脫關係甚為密切之高麗人姜融。可以想見的是，以佛教為國教之高麗王朝，當地之士宦階層或許曾經耳聞過玄奘大師西行取經，以及其從事佛典翻譯之偉大事業，或許亦知道中國通俗小說「唐僧西天取經」的神異故事，然卻未必十分熟悉其事。相對於中土而言，高麗地處域外，又是奇皇后與高龍普的生身母國，在塔基第二層雕刻具有佛教色彩之「西遊」故事浮雕，自無不宜，然是否係出於有心之做為，而於二十幅圖之中趁機新作一件「西遊」故事，並且將其混入當地並不十分熟悉，而且是元蒙帝國之中樞大員不大可能會親蒞其地、與聞其事的時空，藉此達到宣洩心中不平，甚至是醜化政敵之目的⁴⁷，此一做為實一如中國歷代許多類似之文學作品的處理模式一般，二者如出一轍，而「車遲國」之圖文獨見於高麗的現象，的確足以引發此類想像。⁴⁸

⁴⁷ 雖然，「車遲國」一事有可能是依據「古本」《西遊記》之插圖進行刻繪，然該圖也有可能並未見於「古本」《西遊記》中，而是一幅具有特殊「政治目的」之圖像。若此，則《朴通事》所載「見國王敬佛法，便使黑心，要滅佛教」之伯眼大仙，其與丞相伯顏「同音異字」，應當不只是一項巧合而已。設若此說得以成立，則四大圖原本應依「順時鐘」方向進行，如是方才符合佛教觀念，然南北二面大圖發生錯位之突兀，呈顯出「非順而逆」的次序，或許並非是「無心」之錯置，而是一項「有意為之」的做為。

⁴⁸ 在以佛教「佛會圖」為主體的石塔之上，一般人關注之重點，理當是放在塔身之十層佛會圖，塔基三層雖然亦是該建築體的其中一部分，然並非主

三、「朱紫國」故事中的元蒙制度

西遊故事本自於真人真事，然不論是宗教傳記或是小說敘事，諸多文本總是夾雜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倘若人們能夠跳脫出文學是純然虛構、想像的觀點，則《西遊記》所載錄之許多單元故事的內容，或許未必全然只是建構在「異域」的想像書寫，抑或是強調「尚奇」、「志異」的虛構敘事，而是某一特定時代人事、制度經過文學創作者「修飾」、「變易」之後的寫實具現。試以百回本《西遊記》「朱紫國」一事為例，書中嘗載錄一段乍看之下頗為奇特，迥異於中國「后妃制度」的文字敘述，試先引錄其文如下：

（朱紫國）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后，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后，都稱為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將正宮稱為金聖宮，東宮稱為玉聖宮，西宮稱為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行者急上前，將國王攙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聖宮去後，這一向可曾再來？」國王道：「他前年五月節攝了金聖宮，至十月間，來要兩個宮娥，是說伏侍娘娘，朕即獻出兩個。至舊年三月間，又來要兩個宮娥，七月間，又要去兩個，今年二月裡，又要去兩個，不知到幾時又要來也。」行者道：「似他這等頻來，你們可怕他麼？」國王道：「寡人見他來得多遭，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第69回，頁1763、1765）⁴⁹

體建築而是附屬之物。由於西遊浮雕各圖之內容多有所本，然若是在眾圖之中暗藏玄機，穿插一則另有所本且有所影射之故事，在當地民眾眼中看來，因不甚熟悉其事之故，相信不會引起太大的注意，且其事遠在高麗，征東行省雖為元蒙帝國之代理機構，然面對中央政府真正的當權者奇皇后，及與其關係至為密切之高龍普，在其故鄉刻鏤一幅與《西遊記》相關之圖，在眾圖皆為原本之《西遊》故事，這正是令人足以感到質疑的地方。

⁴⁹ 本文所引《西遊記》係以明·世德堂本《西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在上引文字的敘述中，有二事宜應特別注意，一是有關「王后」的問題，一是有關「索女」的問題。試分述如下。

（一）「一王三后」與元蒙婚俗

乍讀朱紫國故事，一般人往往是在「先入為主」的思維下思索其事，認為《西遊記》乃是一部神魔小說，其所特具之「異域想像」及「神異色彩」，乃是該書本應有者，誠不足為奇。此種「以奇為常」、「以異為正」的心態，往往會左右讀者對於文本實質意涵之理解，甚或是阻斷人們進行深入探索的強烈企圖，於不知不覺中造成認知上的一道迷障，至若其事是否為一種「寫實」之具現，遂因此而為人們所輕忽。試以元蒙之婚俗為例，《元史》卷106〈后妃表〉云：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為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代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則有曰幹耳朵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修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秘，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

社《古本小說集成》本）為主，其下逕標回數、頁碼，不另出注，特此說明。又，《西遊記》「比丘國」故事，作者刻意安排「驛丞」口述，讓人們對於發生於該國異事之來龍去脈，有著較為詳實之瞭解，其文云：「此國原是比丘國，近有民謠，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樣，攜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歲—其女形容嬌俊，貌若觀音。一進貢與當今。陛下愛其色美，寵幸在宮，號為美后。近來把三宮娘娘、六院妃子，全無正眼相覷，不分晝夜，貪權不已。如今弄得精神倦瘦，身體尪羸，飲食少進，命在須臾。太醫院檢盡良方，不能療治，那進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誥封，稱為國丈。……」（第78回，頁1993、1996）其所描繪之「比丘國」後宮，同樣亦是言「三宮娘娘」，然似為泛稱。另外，「烏雞國」亦出現「三宮皇后」（第37回，頁919）及「正宮皇后」（第38回，頁940）二詞；「車遲國」則於隔板猜枚事中出现之「三宮皇后」（第46回，頁1163）與「滅法國」被剃光頭髮之「三宮皇后」（第84回，頁2161），根據該單元故事之前後語義判斷，二事均謂一人而言。上述《西遊記》諸多「單元」故事中所言之「三宮皇后」，或謂一，或非一，足見其事或仍有保持元代之狀者，亦有經後人修訂而側重於「異」者。

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⁵⁰

觀〈后妃表〉所載，太祖時之「斡耳朵」有五（大、一、二、三、四），每一斡耳朵之皇后非一。太宗時則有「昂灰二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三皇后」、「禿納吉納六皇后」；定宗時有「斡兀立海迷失三皇后」；憲宗時有「出卑三皇后」。⁵¹足徵元蒙帝王之皇后實非一也，此當與其族之婚俗制度有關，然若是以中國熟悉之制度強加其上，則其與真實必定是相去甚遠。

過去，人們對於元蒙后妃制度的認識，誠可說是一知半解⁵²。事實上，元蒙皇后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即所謂之「干政」），就中國歷代諸多王朝而言，實屬罕見。⁵³相應於中國眾所周知之「一王一后」的帝后制度，唐僧西行取經所歷諸國「一王三后」之異常書寫，就中土熟知之既定觀點而論，泰半會將此一現象視之為「異」，然因該書「虛勝於實」之特性使然，加上來自大唐之取經僧眾一行身處西方「異地」，縱令是其所言之內容殊異非常，在「異」的想像與書寫（異人、異地、異事）之特殊認知前提下，許多原本應當視之為異者，亦將因此而頓變為常，不復為異。詳言之，此類「單元故事」所言之故事內容，或許未必純然是由「志異」觀點出發，繼而衍生而來之文學想像，它極有可能是對於元蒙婚姻制度的一種具體、存真的寫實描述。蔡美彪〈元秘史中所見古代蒙古之婚俗〉一文嘗云：

⁵⁰ 見新校本《元史》，頁 2693。

⁵¹ 見新校本《元史》，頁 2693-2702。

⁵² 朱誠如主編《中國皇帝制度》第四章「后妃」云：「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權。它的后妃制度沿襲了突厥人和回鶻人的舊俗。汗的妻稱可敦，貴妾也稱可敦，即皇后。其它庶妾，都稱妃子。終元之世，后宮的名號，只有皇后和妃子 2 等。……遼、金、元、明、清時期的后妃制度，也都與朝廷命官相比附，大同小異，不贅述了。」見《中國皇帝制度》（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其書所言，失之於略，故言。頁 388、391。

⁵³ 朱子彥，《后宮制度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第八章嘗別立「蒙元皇后與元朝政治」一目，標舉出元代后妃干政之特點，主要有三：「攝國稱制、選立嗣君與輔佐皇帝」、「帝、后之間的矛盾和爭鬥」、「元代皇后頻繁干政的原因」（頁 432-440）可參照。

古時的蒙古人既有了上面幾種不同的婚娶方式，便自然形成一種「多妻」制。⁵⁴

蔡氏於此所言之「幾種不同的婚娶方式」，包括：索妻、訂婚、從嫁、送嫁、新婦見姑翁禮、擄掠婚、收繼婚、賜妻、獻納等，故元蒙實多為「一夫多妻」者。徵諸元代歷史，元順帝在位期間，曾經同時冊封多位皇后（詳注28、37），此一事實與前述「車遲國」故事的情況，實是不謀而合。

根據上述所言之元蒙傳統婚俗及歷史事實背景，朱紫國故事之敘述，應當是文學創作者援引當代婚俗、史事入文，而非單純是「為異而異」之虛構想像。不容諱言，其事雖非全然寫實，其所述者或係建構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之上，其所言者應是元蒙王朝之婚姻體制，人們實不宜先入為主之以中土想法為中心，主觀認為其乃是「異域」想像書寫下之文學產物，在慣性思維下，將凡是不符合傳統中國制度者，盡皆視為是文學虛實想像之「異類」產物，如此之思考模式勢將去所謂之歷史事實漸行漸遠，亦不利於對文本之創作年代做出正確判斷。

（二）「索討宮娥」與高麗貢女

其次，則是朱紫國故事中之妖怪：賽太歲，每年都會向朱紫國王索取宮娥，用以服侍早先被擄至妖洞之中的正宮娘娘：金聖宮⁵⁵。「索女」一事看似平淡無奇，而且是一年多次勒索，然其事之意涵或許未必如同故事情節所描述之情況一般單純，或與元蒙時期之高麗「貢女」制度存有一定之關係。

⁵⁴ 見氏著，《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78。

⁵⁵ 《元史》卷204〈宦者列傳〉載云：「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闖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頁4551-4552）《西遊記》於此所言「金聖宮」一詞，與奇皇后擔任第二皇后時所居之「興聖宮」，亦只是一字之別，此一差異是否只是出於巧合，抑或是二者之間具有某種關聯，乃是文學創作者有所本之變異，值得深思。元朝皇后分為第一、第二、第三，《西遊記》則以金、銀、玉名之，名稱雖異，義則相同。

乍觀其事，「索女」服侍皇后之說頗能切合事理，一切看似順理成章，亦是此一「單元故事」之表面說法，然其事是否係以元代之「高麗貢女」制度（元蒙帝國向高麗王朝要求進獻一定數額之女子）為藍本，據以鋪陳而成？意即其事乃是奠基在一定的「歷史真實」基礎上所進行之「文學創作」，無疑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換言之，朱紫國故事中「索取宮娥」之描述，是否為元蒙帝國要求高麗王朝進獻「貢女」之文學變相說法？而朱紫國國王心中忐忑，不敢拒絕其請，則係緣於「一則懼怕，二來又恐有傷害之意」，此亦是在朝貢制度下，藩屬國面對宗主國「不情之請」的心態反映。檢視高麗貢女之歷史，縱然高麗國王對於元蒙帝國索取貢女一事，國內之議論紛然，然主事者在審時度勢之後，仍舊採取「不得不然」之做為，似乎是其所必須做出之對國家傷害最輕的適當舉措。倘若文學作品所書之內容，具有一定之歷史指標意義，係對於歷史的一種表記，足以反映當代實事，則對於文學作品是否意有所指，及其所指者究為何事等一連串問題的思考，就頗堪玩味。拙文〈韓國所見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重要性試論〉曾經指出：

歷來，對於西遊故事「國名」之討論，一是將其視為具有「諧謔」性質之文學創作，創作者之用意實是昭然若揭，諸如以「烏雞」諧「無稽」；一是以作者所處時代先後之人事入書，此類故事或深具「嘲諷」意味，然因其事頗有訾議當代之嫌，內容亦相對隱諱，諸如「比丘國」故事即屬之。⁵⁶當然，《西遊》書中仍有許多「單元故事」的屬性不甚明確，研究者試圖根據相關的文史知識及考證之功，將故事文本與過去歷史進行連結，使之成為解開文學創作的主要關鍵。⁵⁷

⁵⁶ 詳參見謝明勳，〈《西遊記》與明世宗：以「比丘國」故事為中心考察〉一文所論。《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 681-706。

⁵⁷ 見《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76。

事實上，《西遊記》各單元故事之國名，絕非是隨意而取，其中或多具有意義者。上引文所舉之「烏雞國」、「比丘國」（小子城）等，皆屬之，本文所論之「朱紫國」之義，亦應是同於此理者。「朱紫」二字，典出《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一句，因紫並非正色，故取朱而自代，其義正明。《西遊記》「朱紫國」之命名是否另有指涉，具有政治批判之意味，呼應前述之蒙古婚俗與高麗貢女制度，其事之意義遂因此而變得容多想像。本此概念，「車遲國」⁵⁸一詞是否與此類同，同樣具有高度文學想像空間。⁵⁹

在元代詭譎多變的宮廷爭鬥中，奇氏十分善於利用高麗宮女作為其賄絡朝廷大臣之用，其將具有相同出身背景之高麗宮女送與大臣，除了可以藉由賞賜達到收攬人心之目的，對於以奇氏為首之高麗集團而言，最為主要之功效無疑是佈建一套以高麗貢女為主體之人際網絡，達到互通消息，甚至是就近監視之目的。（明）權衡《庚申外史》載云：

（至正十八年）帝嘗為近幸臣建宅，自畫屋樣，又自削木構宮，高尺餘，棟梁楹檻，宛轉皆具，付匠者按此式為之，京師遂稱魯班天子。內侍利其金珠之飾，告帝曰：「此房屋比某人家殊陋劣。」帝輒命易之，內侍由此刮金珠而去。二后見帝造作不已，嘗挽帝衣極諫，且曰：「勞心造作，又惑于天魔隊舞衣女，何其不自愛聖躬也。」帝怫然怒曰：「古今只我一人耶！」由是兩月不到後宮。祔后無可奈何，乃蓄高麗美女，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

⁵⁸ 關於此一國名，是否只是一個單純的「歷史名詞」，抑或其事尚有其他可能存在？過去，或有人將其與西域三十六國之「車師國」相連並想，車師乃是位於西方絲道路上之古國，建於西漢，亡於北魏，國祚約有五百五十年；或有人認為其乃新疆之 Kuchar 或 Kuche 之音譯，Kuchar 乃是維吾爾語，係「歷史悠久」之意，前代文獻所載之「庫車」、「龜茲」、「丘茲」等，皆為其音譯。詳參見季羨林，《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一書。

⁵⁹ 如前所述，「車遲國」故事之文字文本，目前僅見載於《朴通事》一書，「車遲」二字於漢字系統之意義，不甚明確，竊疑其或乃是當代之高麗語音，而以漢字擬音方式予以表記。設若本文對於「車遲國」故事之假設與推斷得以成立，係具政治意義之文學產物，則「車遲國」之國名或乃是「古代高麗語」發音之可能性，亦將因此而大幅提升，至若此語是否別具意義，容後再考。

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高麗女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為高麗女。以故四方衣冠靴帽，大抵皆依高麗矣。⁶⁰

高麗宮女乃是由藩屬國進貢，提供宗主國使用之外來人力，他們在具有相同之國族文化與淒涼之身世背景的情況下，休戚與共，漸次形成特殊的人際網絡，最後並且成為當代的一種特殊時尚。奇皇后因緣際會而得以位居高位，自然而然形成以其為首之高麗貢女集團，藉由彼此互通訊息之人際網絡，將原本之卑微出身轉變成為一種族群優勢。是以當其身處危險之境，亦是善於反覆運用此一特點，以此做為脫身之策略。《元史》卷114〈后妃列傳〉云：

（至正二十五年）四月庚寅，孛羅帖木兒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后仍回幽所，後又數納美女於孛羅帖木兒，至百日，始還宮。⁶¹

即為是例。《西遊記》因文本之屬性使然，對此並未著墨，但只是強調索取宮娥之目的，在於服侍正宮皇后而已。倘若讀者將每年多次索取宮娥一事，聯想到發生在有元一代之元蒙帝國與高麗王朝之間的進貢關係，則許多原本看似平常無異之陳述，勢將因此而頓變成為「可能」具有某種政治指涉意義的文學書寫，而原本單純之故事文本敘事，亦將因此而承擔起傳承部份歷史真實的重責大任，而所謂之「古本」《西遊記》的成書年代及對西遊故事源流之討論，就有重新省視之必要。

⁶⁰ 見《庚申外史》，頁21-22。又，《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四庫備要》本，冊14）卷214同載其事，事文略同：「后亦多畜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遺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為名家。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鞞帽、器物，皆仿高麗，舉世若狂。」（頁21B）可參看。

⁶¹ 見新校本《元史》，頁2881。其事同見於《元史》卷46〈順帝本紀〉：「（至正二十五年三月）丙寅，孛羅帖木兒幽置皇后奇氏於諸色總管府。……夏四月庚寅，孛羅帖木兒至諸色總管府見皇后奇氏，令還宮取印章，作書遣皇太子，遣內侍官完者禿持往冀寧，復出皇后，幽之。……十二月乙卯，詔立次皇后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合氏，詔天下，……。」（頁969）事文較詳，可參看。

四、結語

二十世紀初期，胡適在魯迅的研究基礎上發表〈《西遊記》考證〉一文，該文嘗針對「孫行者」之來歷進行探索，並且提出：「但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在中國文化「西來說」普遍盛行的特殊時空背景下，此種「臆測性」觀點的出現，實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當年，胡適依照俄人鋼和泰博士的指引，跳脫出中國傳統水神「無支祈」的固有說法，將孫行者的人物原型指向印度猴神「哈努曼」⁶²。胡適這種舶來品之「假設」性說法，乃是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已經持續千百年的概念上，細究其事，此一說法雖「不無可能」，然若是要明確證成其事，無疑是缺乏「直接證據」。有趣的是，「哈努曼」之說自從被胡適提出，在「既難證明，亦難否定」之兩難情況下，亦在不知不覺中流傳了將近一個世紀。

一如眾多學者所論，《西遊記》一書乃是以「滾雪球」的方式，在眾口繪聲中漸次成形，而成書於明萬曆年間之世德堂本《西遊記》，乃是目前所知之最早《西遊記》刻本，此亦是百回本「西遊」故事定型的时间下限。雖然有許多學者均認為，在此之前應有一「古本」《西遊記》存在，然此一「假設」在欠缺實際之「文字文本」佐證的情況下，同樣是難以被明確證成；現存韓國之敬天寺十層佛教石塔「西遊」故事浮雕的提出，無疑是在「圖像文本」的間接證據上，補足古本《西遊記》「可能存在」的事實。在以世本《西遊記》為基礎，對古本《西遊記》進行推敲的同時，「車遲國」故事的情況又與其他「西遊」單元故事的狀況大不相同，因其他單元故事在中國境內或有相關之文學作品存世，或是以「有目無文」的方式宣告其曾經存在的事實，而類似車遲國故事「前無可考」之情況，實

⁶² 見氏著，〈《西遊記》考證〉，收錄於《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臺北：盤庚出版社，1977），頁337-341。

屬罕見，其事或係「前無所本」的可能性，遂因是而相對提高，其可能之創作時間與創作緣由，或與敬天寺十層佛教石塔之興建，存有一定之關係。

本文根據塔記銘文所載，先由出資建塔之「高龍普」切入，因其乃出身高麗之宦官，由當代之高麗貢宦、貢女制度連結至與其關係密切之「奇皇后」；再由奇皇后在元蒙宮廷之「政治博弈」關係，推測獨見於韓國之「車遲國」故事出現之可能原因，或與奇氏在冊封為后的過程中，與其政治對手之間的相互抗衡密切相關。當時反對奇氏冊立為后最力之主要政治人物：丞相「伯顏」，恰與《朴通事》所載之「使黑心，要滅佛教」的伯眼大仙「同音異字」，這一連串的巧合不禁讓人從「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做出適度聯想。眾所周知，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許多不同政治主張之敵對陣營，或試圖通過文學作品的書寫，而達到打擊、汗讎政敵之主要目的，這在文學創作的「動機論」上實非特例，儼然已經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慣用手法。其次，則是由另外一位出資建塔者高麗人「姜融」切入，其女原乃高麗貢女，後來成為丞相脫脫之姬妾；而高麗出身之奇皇后，其與脫脫一家之關係匪淺；加上脫脫與伯顏雖為伯姪關係，然因政治立場不同，脫脫轉向元順帝輸誠，伯顏之垮臺亦是因脫脫密告之故。

再者，何以「車遲國」故事僅見傳於高麗，而未見中土相關典籍載錄其事，此一情況在政治意義上，或因其地緣關係具有一定之隱密性所使然。元蒙帝國雖將高麗設為征東行省，兩國之間亦長期存有朝貢關係，然在遠離中國行政中樞的邊陲一隅，高麗王室對於元蒙帝國因朝貢關係，本來便心存不滿；加上元順帝對於伯顏之專橫，本亦多有不平；高麗國王則因廢立問題，對於丞相伯顏頗多微詞；而建塔之地恰巧又是與伯顏長期處於對立關係之奇皇后的出身國度，在此一遠離中樞之特殊地點，言述某種隱微之事，應當不致於過度招搖，甚至是引起已經垮臺多年之丞相伯顏同黨的強烈反感，進而成為其反撲的一項藉口。易言之，「車遲國」故事或乃是奇皇后所屬之高麗集團，在高麗王室的默許下，與元蒙丞相伯顏之間糾葛多年之政治鬥爭下的文學產物，其事之可能性亦因上述所論之諸多原因而大幅提升。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元〕權衡，《庚申外史》（收錄於《西使記（及其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
- 〔明〕宋濂等，《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明〕世德堂本《西遊記》（《古本小說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
-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
- 〔朝鮮〕李荇等，《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奎章閣藏木板本。
- 〔朝鮮〕李宗瑞編，《高麗史節要》（《朝鮮史料叢刊》），京城，朝鮮總督府，1938（昭和13）年）。
- 〔朝鮮〕金昌協，《農巖集》：金甯漢1928年《三刊本》。
- 〔朝鮮〕蔡壽，《懶齋先生文集》：蔡鴻淵1938年石刻本。
- 〔朝鮮〕鄭麟趾撰，《高麗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4。
- 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 朱子彥，《后宮制度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朱誠如主編，《中國皇帝制度》，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
- 李時人，《《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臺北：盤庚出版社，1978。
- 徐忠明，《《老乞大》與《朴通事》：蒙元時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
- 喜蕾，《元代高麗貢女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
- 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蔡美彪，《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2。
- 蔡鐵鷹，《西遊記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
- 謝明勳，〈《西遊記》與明世宗：以「比丘國」故事為中心考察〉，收錄於《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

（二）期刊論文

- 石昌渝，〈《朴通事諺解》與《西遊記》形成史問題〉，《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2007.05）。
- 鄭恩雨，〈敬天寺址10層石塔三世佛會考〉，《美術史研究》第19號（2005）。
- 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唐僧「十世修行」說考論〉，《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07）。
- 謝明勳，〈韓國敬天寺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圖解〉，《中語中文學》第56輯（2013.12）。

Selected Bibliography

- Ji Yun, Yueweicaotangbiji (Jottings from the Thatched Abode Hall of Close Observations) (Tianjin: Tianjin gujichubanshe, 1984).
- Liu Yinbo, Xiyoujiyanjiuziliao (A Compendium of Materials on the Research on Journey to the West) (Shanghai: Shanghai gujichubanshe, 1990).
- Zhu Yixuan, Liu yuchen, eds. Xiyoujiziliaohuibian (A Compendium of Material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Tianjin: Nankaidaxuechubanshe, 2002).
- CaiTieying, Xiyoujiziliaohuibian (A Compendium of Material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Beijing: Zhonghuashuju, 2010).
- Kanbo (Joseph Campbell), Zhu Kanru (tr.), Qianminyingxiong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Taibei: LiXuwenhuashiyegongsi, 2006).
- [Korea] ZhengLinzhi, Gaolishi (History of Korea) (Tainan: Zhuangyanwenhuashiyegongsi, 1986).
- HengQuan, Gengshenwaishi (An Unofficial History of Gengshan), in Xishiji (jiqitasanzhong) Envoy to the West (and 3 Other Works) (Beijing: Zhonghuashuju, 1985).
- Li Zongrui ed. Gaolishijieyao (A Short History of Korea) (Jingchen: Chaoxianzongdufu, 1938).
- Song Lian et. als. Song Shi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Taibei: Dingwenshuju, 1981).
- Journey to the West (Ming Shidetang version) in Gubenxiaojicheng (Assembly of Ancient Text Fiction Collection) (Shanghai: Shanghai gujichubanshe).
- Hu Shi, Zhongguozhanguhuixiaoshuokaozheng (Textual Researses on Chinese Serialized Novels) (Taibei: Pangengshuju,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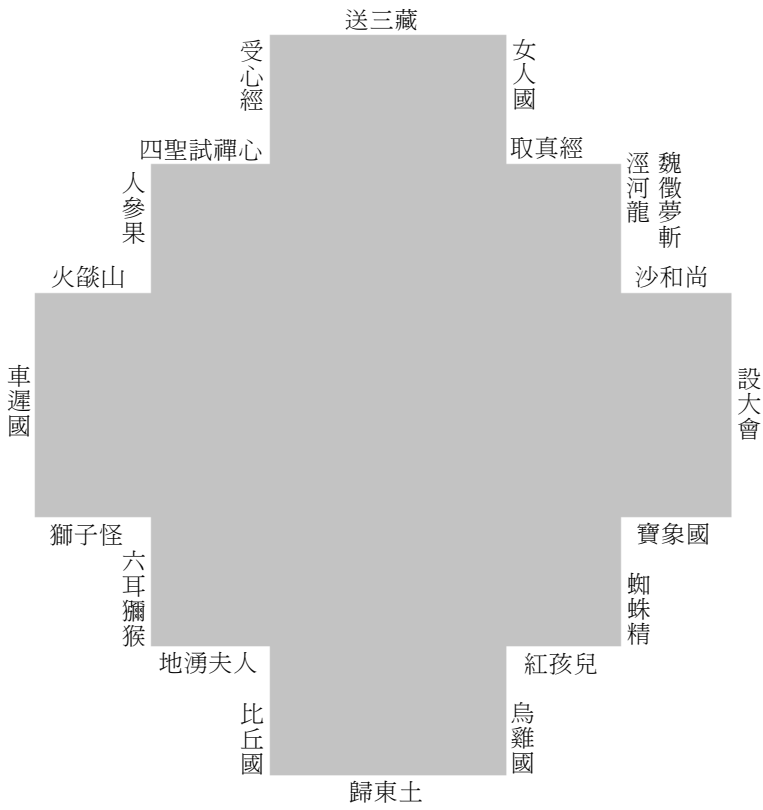
附錄一：《朴通事》「車遲國」故事及《朴通事諺解》所載之《西遊記》⁶³

「到車遲國，和伯眼大仙鬪聖的，你知道麼？」「你說我聽。」「唐僧往西天取經去時節，到一箇城子，喚做車遲國。那國王好善，恭敬佛法。國中有一箇先生，喚伯眼，外名喚燒金子道人。（《西遊記》云：有一先生到車遲國，吹口氣，以磚瓦皆化為金，驚動國王，拜為國師，號「伯眼大仙」。）見國王敬佛法，便使黑心，要滅佛教，但見和尚，便拿著曳車解鋸，起蓋三清大殿，如此定害三寶。一日，先生們做羅天大醮，唐僧師徒二人，正到城裡智海禪寺投宿，聽的道人們祭星。孫行者師傅上說知，到羅天大醮壇場上藏身，奪喫了祭星茶果，卻把伯眼打了一鐵棒。小先生到前面教點燈，又打了一鐵棒。伯眼道：「這禿廝，好沒道理。」便焦燥起來，到國王前面告。未畢，唐僧也引徒弟去到王所，王請唐僧上殿。見大仙打罷問訊，先生也稽首迴禮。先生對唐僧道：「咱兩箇冤讎不小可裏。」三藏道：「貧僧是東土人，不曾認的，你有何冤讎？」大仙睜開雙眼道：「你教徒弟壞了我羅天大醮，更打了我兩鐵棒，這的不是大讎？咱兩箇對君王面前鬪聖，那一箇輸了時，強的上拜為師傅。」唐僧道：「那般著。」伯眼道：「起頭坐靜，第二櫃中猜物，第三滾油洗澡，第四割頭再接。」說罷，打一聲鐘響，各上禪床坐定，分毫不動，但動的便算輸。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頭髮，變做狗蚤，唐僧耳門後咬，要動禪，孫行者是箇胡孫（勳案：當作「猢猻」），見那狗蚤，便拿下來磕死了，他卻拔下一根毛衣，變做假行者。靠師傅立的。他走到金水河裏，和將一塊青泥來，大仙鼻凹裏放了，變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聲，跳下床來了。

⁶³ 見引自《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一書，頁292-309。本書係據韓國奎章閣藏書影印。正文部分為《朴通事》所載之「車遲國」故事，括弧部分之《西遊記》則為《朴通事諺解》之文，特此說明。又，「車遲國」故事中多有俗寫或訛誤之文字，此一部分則以「案語」方式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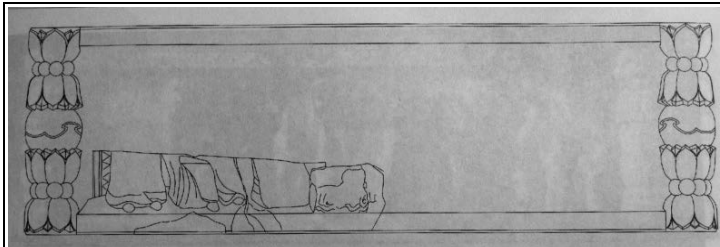
王道：「唐僧得勝了。」又叫兩箇宮娥，擡過一箇紅漆櫃子來，前面放下，著兩箇猜：「裏面有甚麼？」皇后暗使一箇宮娥，說與先生：「櫃中有一顆桃。」孫行者變做箇焦苗虫兒，飛入櫃中，把桃肉都喫了，只留下桃核。出來，說與師傅。王說：「今番著唐僧先猜。」三藏說：「是一箇桃核。」皇后大笑：「猜不著了。」大仙說：「是一顆桃。」著將軍開櫃看，卻是桃核，先生又輸了。鹿皮對大仙說：「咱如今燒起油鍋，入去洗澡。」鹿皮先脫下衣服，入鍋裏，王喝保的。其間，孫行者念一聲「唵」字，山神、土地、神鬼都來了，行者教千里眼、順風耳等兩箇鬼，油鍋兩邊看著。先生待要出來，拿著肩膀彪在裏面。鹿皮熱當不的，腳踏鍋邊，待要出來，被鬼們當（勳案：當作「擋」）住出不來，就油裏死了。王見多時不出時，「莫不死了麼？」教將軍看。將軍使鈎子，搭出箇爛骨頭的先生。孫行者說：「我如今入去洗澡。」脫了衣裳，打一箇跟斗（勳案：當作「頭」），跳入油中，纔待洗澡，卻早不見了。王說：「將軍，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將軍用鈎子搭去，行者變做五寸來大的胡孫（勳案：當作「猢猻」），左邊搭，右邊趨，右邊搭，左邊去，百般搭不著。將軍奏道：「行者油煎的肉都沒了。」唐僧見了啼哭，行者聽了跳出來，叫：「大王，有肥棗麼？與我洗頭。」眾人喝保，佛家贏了也。孫行者把他的頭，先割下來，血瀝瀝的腔子立地，頭落在地上，行者用手把頭提起，接在脖項上依舊了。伯眼大仙也割下頭來，待要接，行者念：「金頭揭地、銀頭揭地、波羅僧揭地」之後（《西遊記》云：釋迦牟尼佛在靈山雷音寺演說三乘教法，傍有侍奉阿難、伽舍、諸菩薩、聖僧、羅漢、八金剛、四揭地、十代明王、天仙、地仙。（下略））變做大黑狗，把先生的頭拖將去，先生變做老虎趨，行者直拖的王前面，彪了，不見了狗，也不見了虎，只落下一箇虎頭。國王道：「元（勳案：當作「原」）來是一箇虎精，不是師傅，怎生拿出他本像？」說罷，越敬佛門。賜唐僧金錢三百貫、金鉢盂一箇；賜行者金錢三百貫，打發了。這孫行者正（勳案：當作「真」）是了的，那伯眼大仙那裏想胡孫（勳案：當作「猢猻」）手裏死了。古人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附錄二：韓國敬天寺（含圓覺寺）元代佛教石塔 「西遊」故事浮雕方位圖



附錄三：敬天寺（含圓覺寺）佛教石塔「西遊」故事浮雕之 「車遲國」釋圖⁶⁴

本圖毀損嚴重，內容已不復辨明，僅存左下部分，尚不足全圖四分之一，今見者僅為一人站立、一人端坐之下半身圖樣。（參見：附圖23）徵諸圓覺寺圖可知，本圖當為「車遲國」故事。圖左一人站立，當為侍者或官員，端坐者當為車遲國王。本圖中央置有一大油鍋，鍋旁站立者當為監看雙方賭勝之官員，油鍋兩側分立二人，左側或為道士（伯眼大仙），右側執杖者或為僧人。（參見：附圖24）



附圖 23（敬天寺，頁 496）



附圖 24（圓覺寺，頁 164）

⁶⁴ 「附錄三」之文字說解，見引自拙著〈韓國敬天寺元代石塔「西遊」故事浮雕圖解〉，頁 186-188。本附錄之目的，係為使讀者明白該浮雕所繪之圖像內容，及其與《朴通事》和百回本《西遊記》之關係，故徵引之。

此圖所繪應是《朴通事》所載車遲國「滾油洗澡」一事，試徵引其文如下：

鹿皮對大仙說：「咱如今燒起油鍋，入去洗澡。」鹿皮先脫下衣服，入鍋裏，王喝保的。其間，孫行者念一聲「唵」字，山神、土地、神鬼都來了，行者教千里眼、順風耳等兩箇鬼，油鍋兩邊看著。先生待要出來，拿著肩膀颯在裏面。鹿皮熱當（勳案：當作「擋」）不的，腳踏鍋邊，待要出來，被鬼們當（當作「擋」）住出不來，就油裏死了。王見多時不出時，「莫不死了麼？」教將軍看。將軍使金鈎子，搭出箇爛骨頭的先生。孫行者說：「我如今入去洗澡。」脫了衣裳，打一箇跟斗（勳案：當作「頭」），跳入油中，纔待洗澡，卻早不見了。王說：「將軍，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將軍用鈎子搭去，行者變做五寸來大的胡孫（勳案：當作「猢猻」），左邊搭，右邊趨，右邊搭，左邊去，百般搭不著。將軍奏道：「行者油煎的肉都沒了。」唐僧見了啼哭，行者聽了跳出來，叫：「大王，有肥棗麼？與我洗頭。」眾人喝保，佛家贏了也。

「車遲國」事另見《西遊記》第44-46回，「下滾油鍋洗澡」一事見載於第46回「外道弄強欺正法，心猿顯聖滅諸邪」，係言羊力大仙與孫悟空鬪勝，事同文異，所載較《朴通事》為詳，其文略云：

國王道：「你有甚麼法力贏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著香油，教他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歹盪盪去。」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著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尚先下去。……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原作「布」）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鬪浪，就似負水一般玩耍。（頁1176-1177）……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卻伸手探了一把，呀（原作「啞」）！那滾油都冰冷，……

急縱身跳在空中，念聲「唵」字咒語，把那北海龍王喚來，……那龍王化一陣狂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行者下來，與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裡打掙，爬不出來。滑了一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此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叢刊》收錄之世德堂本《西遊記》，頁1180-1181）

世德堂本《西遊記》第46回附有名曰「孫大聖油鍋賭洗澡」之插圖，圖右有一油鍋，孫行者身在鍋中，鍋旁有二人，一人添加柴火，一人似與之言，圖左則為唐三藏、豬八戒、沙和尚三人立於樹下觀看，其後有一文士之狀者，疑當為羊力大仙。（頁1174-1175）本圖與敬天寺西遊故事浮雕，構圖顯然多有不同。

The Relation between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Yuan Dynasty: Using “Chechi” and “Zhuzi” States as Examples

Min-Hsun 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begins with the stories related to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inscribed on the relief on the ten-storied Buddhist tower of Jingtian Temple (敬天寺) built in Gaoli Dynasty period (高麗朝 ca. Yuan dynasty). The story of Chechistate (車遲國) is seen here as well as the written text of *Putongshi* (朴通事 *PakT'angsa*) only. The case that story appears in Gaoli but finds no traces in Chinese documents is peculiar and deserves academic attention.

This article will look into the building process of the stone tower, speculating on the causes of its erecting, trying to relate to its possible connections with the Yuan Dynasty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ories of Chechi and Zhuzi states (朱紫國) in the *Journey*. This could establish the hypothesis that an “ancient proto-text” might already existed in Yuan Dynasty. The story of Chechi in the relief might be the product of political struggle at the time, and the story of Zhuzi could be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 events of Yuan Mongolian marriage customs and the sending of tributary lady attendants from Gaoli to the Yuan Court. This could support the case that fiction is able to reflect the social reality; what were presented in the *Journey* in great measure have their basis in real world. This link in Yuan times, however, has long been missing and ignored by scholars of the *Journey*.

Keywords: Jingtian Temple; Putongshi (Pak t'angsa), State of Chechi, Ancient prototype tex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tributary attendant ladi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